

# 近代女医张竹君在沪行医事迹

曹晓华

若张竹君仅以医者、教师形象示人,在那个国族内外交困的年代也已实属不易,毕竟那时女学初兴,社会对女子的期待还未摆脱“贤妻良母”的窠臼。然而张竹君之所以人称“妇女界之梁启超”,不仅在其女医身份,更在其非凡的政治胆识和活动能力。

1926年夏季的上海,霍乱肆虐,各大时疫医院人满为患。时疫医院大多依靠民间力量组织筹办,是周期性开放应对疫情的临时医院,义务救治受感染的病患,在兵荒马乱的年代,无数百姓在此求医问药。在当时的上海,除了隶属中国红十字会的西藏路时疫医院、天津路时疫医院、沪城时疫医院、闸北两处时疫医院外,还有民间慈善家袁士勋所办的虹镇时疫医院、医商黄楚九主持的白克路时疫医院等。在这些时疫医院中,沪西时疫医院有些与众不同。

这座医院位于星加坡路(今余姚路)42号健华医院内,由健华医院院长张竹君主持。1926年8月,正是上海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,沪西时疫医院就在这个时候开办了。霍乱又称虎疫,染病者吐泻不止,脱水而亡,病人粪便中的霍乱弧菌污染水源后使疫情扩散开来。而同年全国各地共有232次水患,江浙皖三地即有29起(夏明方:《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》,中华书局,2000年,第376页),酷日当空,蔓延的洪水污染河道,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。病患数量激增,中国红十字会在募集捐款抗疫时,提到医院场地辗转多次仍无法容纳前来就诊的病患,可见当时疫情之危急——“近日时疫流行达于极点,本会时疫医院向设天津路,今年开幕后病人早满,故急添设闸北时疫分院在海昌公所,甫开幕病人又满;再将本会新闻路北市医院十六铺、南市医院两处腾空改为病室,而又满;乃商工部局沈家湾医院及虹口同仁医院两处专治时疫,而人又满;不得已商借铁路局海昌路大空地数亩,星夜动工,搭盖临时病室数十间,预备收容数百人”(《申报》,1926年8月22日)。医院病房满员,病人只能四处投医,原本并非专治时疫的医院也想方设法安置病人。张竹君在霍乱疫情初起时,和其他医生一样,每日照常坐诊,全力医治被霍乱感染的病患。然而健华医院毕竟不是专治时疫的医院,张竹君施医赠药并为病人注射针剂后,“叩请转各时疫医院就医,因无时疫留医所之设备也”(《申报》,1926年9

月11日)。然而病人转投时疫医院,发现都已满员,百般无奈下只能又回来找张大夫。张竹君悲痛地发现,很多病患因此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,等她再诊时已经回天乏术。于是她从8月中旬开始筹款,8月19日将原本的临时留医所改成了沪西时疫医院。从8月15日至9月9日,不到半个月的时间,沪西时疫医院便已经诊治2158人(《申报》,1926年9月11日)。

此时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张竹君,已经寓居上海23年了。

张竹君1879年生于广东番禺,排行第五,其父张世蒸为三品京官,精算学。据马君武的《女士张竹君传》和冯自由的《女医师张竹君》,加上当代学者杨奕望的考证,张竹君幼年曾罹患“脑筋病”,半身麻木,家人送其至博济医院,在美国传教士嘉约翰的治疗下痊愈,这段经历让张竹君与西医结缘,长大后即入博济医学堂学习。她习得医术后,自办南福医院,后又将之改为育贤女学,教学与行医并重,为广东女学先声,张竹君也成为中国第一位创办医院的女性。张竹君社交能力极强,在广东时即有“妇女界之梁启超”之名。1902年,张竹君先后前往新加坡、英国考察,适逢新加坡鼠疫泛滥,她便有意学习防疫知识。1904年,广州爆发霍乱,当时还没有自来水的广州人一直从珠江取水,张竹君判断水源已被污染,果断向当局提出从安全区域运水,并禁止病人家属向珠江倾倒呕吐物,当局采纳了她的建议,疫情在数周内也得到了控制。

1904年张竹君迁居上海,很快投入了新一轮的办学、行医、授课中,成为上海第一位挂牌行医的女西医。同年5月,她就创办了女子手工传习所(后改名为育贤女工艺分院)和卫生讲习会,宣传讲授“卫生之理”和“卫生之学”。然而上海毕竟不是广州,张竹君初来乍到,半年后学堂运转便出现了困难,幸好她遇到了江南制造局提调——李平书。李平书生于江苏宝山高桥镇(今上海市浦东新区),虽然出自医学世家,他对医学一开始却并无兴趣,直到母亲因病疾去



习得医术后,自办南福医院,后又将之改为育贤女学,教学与行医并重,为广东女学先声,张竹君也成为中国第一位创办医院的女性。

世,他才开始钻研医术。和张竹君不同的是,李平书相信中医。如同学者皮国立指出的那样,中国当时没有明确的防疫思想,中医无论是温病派还是伤寒派,对于防疫最通行的办法就是发汗,这和西医的疗法相似,而初来中国的西医也将中医的养生学说纳入自己的防疫理论中(皮国立:《近代中西医的博弈:中医抗菌史》,中华书局,2019年,第48-59页)。对于治疗包括痢疾在内的时疫,李平书相信中西医各有所长,可以互相补充。正当张竹君因为育贤女学难以为继而一筹莫展时,李平书从制造局同事姚子让那里听说了她的困境,心有所动,两人便一同去公共租界的育贤女校了解情况。当李平书等人来到女校时,正好碰到房东催逼房租,因女校拖欠租金三月,便扬言钉门,“校中纷扰,校主往外筹款,学生倍觉恐慌”(李平书:《且硕老人七十岁自叙》,文海出版社,1974年,第439页)。李平书当即承诺垫付房租,与房东协商取消钉门一说,事情暂时平息下来。事后张竹君拜李平书夫妇为义父母,并在李平书的帮助下将学校迁往派克路(今黄河路)178号的洋房。

李平书一直致力于中西医汇通,认为中医之气化纠缠于阴阳之说,不及西医血轮之说实用,“余故以内难伤寒诸书为根柢,以全体阐微为参考”,将中西医“冶为一炉”(同上,441)。他和张竹君商量设立女子中西医学

堂,自己教授中医,张竹君教授西医,其他各科另聘教员。在两人的张罗下,1905年3月23日,上海女子中西医学堂在派克路尚贤里落成,张竹君任校长。这是近代国人自办的第一所中西医结合的女医学堂,课程侧重女科女病,招收14-23岁的女学生。张竹君身体力行,努力推动中国妇科的发展。学校简章的缘起部分提到,中国女学荒芜,女子学医更是凤毛麟角,女性除了生产,若有其他症疾,尤其下体之病,医者皆为男性,女患诉说病症尤为不便,致使“男医审女病不过十得其五”,而学校创设正是为了培养女医。为了表明决心,六年之内“李平书不出仕不赴他省当差,张竹君不回粤办事不往他处”(《申报》,1905年1月23日)。

考虑到医学生实习的问题,加上上海租界医院大多为外国人设立,本地的中国百姓、特别是女病人就医很不方便,于是李平书在女子中西医学堂旁边建了一个小规模的海医院(就是今天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),依然由张竹君出任院长。1908年上海医院择址扩建,次年在南市积谷仓(今多稼路)落成,上海女子中西医学院也迁往医院新址,改名为上海女医学校。

张竹君不仅要亲自授课、行医,还要监管学校和医院的各项琐事,全为慈善义举。学校虽是女校,医院虽重产

科,但并不只收女病患,张竹君需要合理调度男女护工,尤其还要时时留意男女病患不同的饮食起居,十分忙碌辛苦。此外,夜间出诊接生也是常事,当时人们大多先选择传统的接生婆,如果来请西医,一般已经到了难产危及生命的时候。陈衡哲曾在女子中西医学堂求学,她对半夜和同学一起跟着张竹君出诊记忆犹新——“那个受苦女人的尖叫和呻吟象钢刀一样刺透了我的心,而且取出的婴儿或者已经死了,或者被切成几块,或者因为父母的什么病已经腐烂成青紫色”(陈衡哲:《陈衡哲早年自传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6年,第109页)。张竹君时时要面对的难产病例,其实是近代女性成长之难的缩影,而她勇敢地选择去分担一部分时代转型的阵痛。

若张竹君仅以医者、教师形象示人,在那个国族内外交困的年代也已实属不易,毕竟那时女学初兴,社会对女子的期待还未摆脱“贤妻良母”的窠臼。然而张竹君之所以人称“妇女界之梁启超”,不仅在其女医身份,更在其非凡的政治胆识和活动能力。1911年10月武昌起义,徐宗汉向张竹君求援,革命军急需黄兴赴汉口领兵,但当时清军对革命党人搜罗甚密,黄兴等人滞留上海,根本无法进入武昌。张竹君急中生智,在李平书、陈继武等人的协助下,以上海医院院长的身份火速组织中国红十字会,旋同红十字会第一团共赴武昌战场实施人道救援,时人盛赞其为“南丁格耳之再现”。实际上,黄兴、徐宗汉、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即隐身于这些护理人员中,张竹君以生命作掩护,为武昌起义贡献了自己最大的力量。她随后在武昌各战场带领红十字会成员舍身忘我救助伤员。同年12月底,汉阳失守,南北议和,张竹君为病人做手术时不幸感染,先行回沪后将红十字会后续工作完成,此后她便专心行医,甚少过问政事。

1913年二次革命,张竹君与红十字会成员二十余人星夜赴南京救护伤员,二次革命失败后李平书前往日本避难,张竹君想方设法维持上海医院,